

跨时空对话视域下鲁仲连文化“四维一体”内涵的理论阐释与当代实践转化

马海燕,尹 莉

(聊城职业技术学院,山东聊城 252000)

[摘要]作为战国士人精神的典型范式,鲁仲连文化并非单一化的“义士”符号,而是由“守大义、以智解纷、轻名利、重民本”构成的“四维一体”有机体系。本文立足历史文献与当代语境的双重维度,通过文本细读与理论建构的双重维度,系统解构鲁仲连文化的核心维度及其内在逻辑;基于历史传播学视域,梳理其在历代典籍中的诠释脉络与精神重构轨迹;结合当代社会现实需求,深入阐释其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在契合性,并构建“理论阐释—实践转化—传播推广”的现代传承路径。研究表明,鲁仲连文化所蕴含的价值内核具有跨越时代的生命力,其现代转化不仅能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提供实践范式,更能为个体价值引领、基层治理效能提升与文化认同培育提供重要的文化资源。

[关键词]鲁仲连;文化内涵;四维一体;历史传承;现代转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作者简介]马海燕(1979—),女,山东菏泽人,讲师,博士,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尹莉(1979—),女,教授,硕士,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

[基金项目]本文系聊城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鲁仲连文化内涵及其时代价值研究”(项目编号:ZXKT2025439)阶段性成果;聊城职业技术学院教学改革课题“系统观视域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课程‘一体两翼,三维联动’教学模式创新研究与实践”(项目编号:2024LZYJ14);2025 年聊城职业技术学院哲学社会科学课题“职业教育数字化背景下高校思政课教师数字素养提升研究”。

[DOI] <https://doi.org/10.62662/llyj0104010>

[中图分类号] B22

[本刊网址] www.oacj.net

[投稿邮箱] llyj2025@163.com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只有植根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沃土,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才能根深叶茂。”这一论述为新时代传统文化研究指明了“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核心方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其当代价值的挖掘与激活,既是回应“两个结合”战略要求的必然选择,也是应对社会转型期精神困境的现实需要。

在当代社会,工具理性的膨胀导致价值判断的功利化倾向,公共精神的式微引发社会责任感的消解,文化认同的碎片化则加剧了精神家园的迷失。在此语境下,重拾历史文化中的精神瑰宝,从中汲取价值滋养与实践智慧,成为学术研究与社会发展的共同诉求。鲁仲连作为战国时期“士”阶层的杰出代表,其“义不帝秦”的民族气节、“射书聊城”的务实智慧、“功成不居”的人格境界与“解民倒悬”的

实践关怀,历经两千余年历史淘洗仍熠熠生辉。

一、鲁仲连文化内涵的“四维一体”解构

鲁仲连的文化形象并非孤立的历史符号,而是由价值内核、实践智慧、人格特质与终极关怀构成的有机整体。这四个维度相互支撑、互为表里,共同塑造了“战国高士”的理想人格范式,展现了先秦士人“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的精神全貌。

(一)“守大义”的精神内核:以道统为骨,拒媚强权

“义”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范畴,在先秦语境中,“义者,宜也”(《中庸》),指合宜的行为准则与价值判断。鲁仲连的“守大义”并非抽象的道德教条,而是植根于对“礼义道统”的坚守与对“天下公义”的担当,集中体现为“以道抗势”的价值立场。

邯郸之围(公元前 257 年)是鲁仲连“守大义”

的经典实践场景。当时,秦军围赵都邯郸,魏安釐王派将军晋鄙救赵,却因畏惧秦威驻军观望,又派客将军辛垣衍潜入邯郸,劝说赵王“尊秦为帝”以解围城之困。在此危急存亡之际,鲁仲连挺身而出,与辛垣衍展开激烈辩论。他开篇即明确立场:“彼秦者,弃礼义而上首功之国也,权使其士,虏使其民。彼即肆然而为帝,过而为政于天下,则连有蹈东海而死耳,吾不忍为之民也!”这一论述直指秦国“弃礼义”的本质——以强权践踏人道,以功利取代道义,揭露了“尊秦为帝”的妥协方案对天下公义的背叛。

鲁仲连的“大义”超越了狭隘的家国界限,具有“天下情怀”的特质。他并非仅为赵国利益辩护,而是从“秦称帝之害将及于天下百姓”的全局视角出发,强调“帝秦”将导致“天子之怒,伏尸百万,流血千里”(《战国策·赵策三》)的人道灾难。这种“义”的内涵包括三层维度:其一,对礼义道统的坚守,反对强权对文化价值的破坏;其二,对人道原则的维护,拒绝暴政对生命尊严的践踏;其三,对士人责任的担当,以“道”的守护者身份对抗“势”的压迫。

与战国时期苏秦、张仪等“士为知己者死”的功利性选择不同,鲁仲连的“守大义”体现了“士志于道”的精神自觉。孔子言:“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论语·里仁》),孟子提出“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公下》)的大丈夫人格,鲁仲连以实际行动践行了先秦儒家的道义追求,将“道统”置于“势统”之上,构建了士人“以道抗势”的价值标杆。

(二)“以智解纷”的行为智慧:不恃武力,巧化干戈

鲁仲连之“义”并非脱离实践的道德空谈,而是与务实智慧紧密结合,形成“义智并举”的实践范式。他反对“义而无当”的迂腐空谈,强调“言必信,行必果”的实践实效,展现了战国士人“以智济世”的行动逻辑。

“驳斥辛垣衍”的辩论艺术集中体现了其“以智解纷”的言说智慧。面对辛垣衍的“尊秦为帝”提议,鲁仲连并未直接否定,而是采用“迂回论证”的策略:先以“昔者齐威王尝为仁义矣,率天下诸侯而朝周。周贫且微,诸侯莫朝,而齐独朝之。居岁余,周烈王崩,齐后往,周怒,赴于齐曰:‘天崩地坼,天子下席。东藩之臣因齐后至,则断。’齐威王勃然怒曰:‘叱嗟,而母婢也!’卒为天下笑”的典故,说明

“帝者”的傲慢本质与妥协的无意义;再以“邹、鲁之臣”宁死不“北面事齐”的案例,反衬“尊秦为帝”的屈辱性;最终直指“秦称帝之害”:“秦无已而帝,则且变易诸侯之大臣。彼将夺其所不肖而与其所贤,夺其所憎而与其所爱。彼又将使其子女谗妾为诸侯妃姬,处梁之宫。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而将军又何以得故宠乎?”层层递进的论证既具历史依据,又切中辛垣衍的利益关切,最终使其“不敢复言帝秦”。

“射书喻燕将”的破局策略则展现了其“以智解纷”的实践智慧。公元前284年,燕将乐毅破齐,聊城为燕所占;后田单复齐,围聊城数年不下,“城中人饿病死者过半”(《战国策·齐策六》),百姓陷入绝境。鲁仲连闻讯,作《遗燕将书》射于城中,以“智者不倍时而弃利,勇士不怯死而灭名,忠臣不先身而后君”破题,为燕将分析局势:从历史维度,列举管仲、曹沫“功立名成”的案例,说明“转祸为福”的可能性;从现实维度,指出“燕军破亡”“聊城久围”的困境,点明“死守无义”的结局;从价值维度,强调“去怨赦罪,与赵为欢”的出路。书信既动之以情(“今公又以敝聊之民距全齐之兵,是墨翟之守也;食人炊骨,士无反外之心,是孙臧之兵也,能见于天下”的肯定),又晓之以理(“为公计者,不如全车甲以报于燕”的务实建议),最终燕将“见鲁连书,泣三日,犹豫不能自决。欲归燕,已有隙,恐诛;欲降齐,所杀虏于齐甚众,恐已降而后见辱。喟然叹曰:‘与人刃我,宁自刃。’乃自杀”,聊城遂破。

鲁仲连的“智”具有鲜明的实践理性特质:其一,立足现实困境,拒绝脱离实际的空谈,如《遗燕将书》始终围绕“解百姓倒悬”的核心目标;其二,尊重人性规律,既承认利益关切(如对燕将“名与利”的分析),又引导价值提升(如对“忠臣义士”的期许);其三,注重方法创新,根据对象差异调整策略——对辛垣衍用“辩论破理”,对燕将用“书信喻情”,体现“因材施教”的智慧。这种“以智解纷”的实践范式,与先秦“辩学”思想一脉相承,更超越了单纯的技巧层面,升华为“以智济义”的价值追求。

(三)“轻名利”的价值取向:功成不居,坚守独立人格

战国时期,“士”阶层崛起,形成“士为知己者死”“合则留,不合则去”的流动传统,但功利主义亦随之盛行,“追名逐利”成为普遍价值取向。鲁仲连“功成不居”的选择,超越了时代局限,构建了“义利之辨”的典范,彰显了士人不依附权势、追求人格独

立的精神境界。

聊城解围后,田单“欲爵之”,鲁仲连却明确拒绝:“吾与富贵而诎于人,宁贫贱而轻世肆志焉。”田单又“益爵之,鲁仲连逃隐于海上”。其拒名利的理由在《战国策·齐策六》中有更清晰的阐释:“所贵于天下之士者,为人排患释难解纷乱而无取也。即有取者,是商贾之事也,而连不忍为也。”在鲁仲连看来,士人之所以尊贵,在于其“排患释难”的公共责任,而非私利追求;若以功谋利,则沦为“商贾之事”,背离了士人“志于道”的本质。

这种“轻名利”的价值取向包含三重内涵:其一,超越物质诱惑的精神自觉,如孔子所言“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其二,拒绝权势依附的人格独立,不将自身价值寄托于爵位封赏,保持“心远地自偏”的精神自由;其三,坚守价值纯粹性的行为准则,避免公共行动被私利污染,确保“义”的纯粹性。与同时期“冯谖弹铗”“苏秦佩六国相印”等功利性选择相比,鲁仲连的“轻名利”更具精神超越性。冯谖为孟尝君“焚券市义”,最终仍以“狡兔三窟”求安身;苏秦“悬梁刺股”,目的是“取尊荣”。而鲁仲连的行动始终以“公义”为出发点,不预设私利回报,其“逃隐于海上”的选择,更是对“天下熙熙皆为利来”的时代风气的反拨,构建了士人“为义而不为利”的人格标杆。正如清代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评价:“鲁仲连一言而秦将却军,聊城书罢而燕将自杀,盖其义重于生,而功成不居,所以为难也。”

(四)“重民本”的实践关怀:以百姓祸福为终极标尺

“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是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核心命题,其萌芽可追溯至先秦时期。鲁仲连将“排患释难”的行动目标始终指向民生福祉,使“义”的价值最终落实到“解百姓之倒悬”的具体实践中,体现了“重民本”的实践关怀。

“反对帝秦”的根本动因在于对百姓疾苦的关切。鲁仲连在驳斥辛垣衍时明确指出,秦若称帝,将“变易诸侯之大臣”“使其子女谗妾为诸侯妃姬”,最终导致“天下百姓皆为之虏”(《战国策·赵策三》)。他并非站在赵国贵族立场辩护,而是以“天下百姓”的命运为出发点,担忧强权政治对民生的摧残。这种对“百姓之害”的警惕,超越了狭隘的邦国利益,展现了“以天下为己任”的民生情怀。

收复聊城的直接目标是解百姓危局。聊城被围数年,“食人炊骨,士无反外之心”(《战国策·齐

策六》),百姓陷入“饿病死者过半”的绝境。鲁仲连介入此事,并非为田单建功,而是为“解城中之困”。其《遗燕将书》虽面向燕将,却始终隐含对“敝聊之民”的关切,强调“救民于水火的紧迫性”。这种将公共行动与民生需求直接挂钩的实践,使“义”的价值不再抽象,而成为“解民倒悬”的具体行动。

鲁仲连的“重民本”实践具有三个特征:其一,民生导向的行动逻辑,所有策略选择均以“百姓祸福”为终极标尺;其二,务实有效的解困路径,如以“射书”而非强攻方式破局,减少战争伤亡;其三,超越阶层的关怀视野,既关注普通民众的生存困境,也理解燕将的两难处境(“欲归燕,已有隙,恐诛;欲降齐,所杀虏于齐甚众,恐已降而后见辱”),体现“民胞物与”的早期形态。

从思想渊源看,鲁仲连的“重民本”与《尚书》“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孔子“仁者爱人”、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的思想一脉相承,是先秦民本思想从理论到实践的重要过渡。与孟子“制民之产”的制度构想不同,鲁仲连的民本实践更具行动性,通过具体问题的解决直接回应民生需求,为后世“以民为本”的实践传统提供了历史范例。

二、鲁仲连精神的历史传承与当代价值坐标

文化精神的生命力不仅在于其初始内涵,更在于其在历史传承中的动态诠释与时代重构。鲁仲连精神历经两千余年,在不同历史语境中被不断赋予新的内涵,始终作为“坚守原则、担当尽责”的文化符号存在,并在当代社会展现出新的价值生命力。

(一)历史传承:历代典籍中的精神重构与接受脉络

司马迁在《史记》中以“好奇伟倜傥之画策,而不肯仕宦,好持高节”评价其人格,将其与邹阳并传,凸显“抗直守义”的精神特质;唐代韩愈在《送孟东野序》中将其列为“不得其鸣”却“有功于世”的士人典范;明清之际,顾炎武等思想家在民族危机中重提“鲁仲连式”的气节,赋予其“守节抗暴”的新内涵。可见,鲁仲连精神在不同历史语境中始终被作为“坚守原则、担当尽责”的文化符号传承,成为士人精神的重要参照。

(二)当代价值坐标:传统精神与现代需求的跨时空对话

在当代社会转型期,鲁仲连精神与现实需求形成多重契合,其“守大义、以智解纷、轻名利、重民本”的核心内涵,为应对社会问题、构建价值体系提

供了重要文化资源。

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精神共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当代中国价值观念的集中表达,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存在深刻的内在契合。鲁仲连文化为核心价值观提供了生动的历史注脚与文化支撑。其“守大义”对应“爱国、公正”,“以智解纷”呼应“敬业、诚信”,“轻名利”契合“友善、文明”,为核心价值观提供了传统文化支撑。

基层治理的历史镜鉴。当代基层治理面临矛盾多元化、诉求复杂化的挑战,单纯依赖强制手段或行政命令难以实现有效治理。鲁仲连“以智解纷”的实践智慧为基层治理现代化提供了重要启示。“以智解纷”的实践智慧对化解基层矛盾、推进治理现代化具有启示意义,倡导以柔性方式解决问题而非依赖强制手段。

个体价值选择的文化指引。针对职场功利主义、“精致利己主义”等现象,“轻名利、重大义”的人格境界为个体提供了超越物质的价值参照。

全球治理的传统资源。“拒媚强权”的正义立场与“以智解纷”的务实精神,可为当代国际关系中的公平正义追求提供历史智慧。

三、鲁仲连文化的现代转化路径

实现鲁仲连文化的活态传承,需突破“古籍尘封”的静态状态,构建“理论阐释—实践转化—传播推广”三位一体的系统化路径,使其从“历史符号”变为生活中的精神坐标。

(一)教育浸润:融入人格培养与价值教育体系

将鲁仲连“义”“智”“廉”“民本”精神纳入中小学传统文化课程与高校思政教育,通过历史故事讲解、价值辨析讨论、实践场景模拟等形式,培育青少年的原则意识、责任担当与务实精神,让传统精神成为人格塑造的“养分”。

(二)社会转化:对接基层治理与公共服务实践

提炼“以智解纷”的智慧内核,转化为基层矛盾调解的工作方法,倡导“情理法结合”的柔性治理;在公共服务领域弘扬“排患释难”的担当精神,鼓励公职人员以民生需求为导向,强化“功成不必在我”的政绩观。

(三)文化传播:以现代媒介激活历史故事生命力

运用纪录片、动画、短视频等新媒体形式,重构鲁仲连“义不帝秦”“射书聊城”等经典场景,突出其精神内核与当代生活的联结;打造“鲁仲连精神”主

题文化产品,如话剧、绘本、数字展览等,增强传统精神的传播力与感染力。

(四)文旅融合:构建“可感知、可体验”的文化场景

依托鲁仲连相关历史遗迹(如山东聊城鲁仲连祠等),打造主题文化景区,通过情景演绎、互动体验等方式还原历史场景;开发“高士文化”研学路线,让公众在实地体验中感悟其精神内涵,实现文化传承的场景化与沉浸式。

(五)价值引领:强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对接

通过理论研究、主题宣传等方式,明确鲁仲连文化与“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等核心价值观的内在关联,举办“新时代鲁仲连精神”研讨活动,推动传统精神与时代价值的深度融合,使其成为涵养社会风尚的重要资源。

四、结束语

鲁仲连文化内涵是“守大义、以智解纷、轻名利、重民本”四维一体的有机体系,其精神内核在历代传承中不断被诠释重构,展现出强大的文化生命力。在当代社会,鲁仲连精神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存在深刻的内在契合性,为个体品格塑造、基层治理优化、文化认同构建提供了重要资源。通过教育浸润、社会转化、文化传播、文旅融合与价值引领的系统化路径,可实现鲁仲连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使其成为推动文化强国建设与和谐社会构建的鲜活精神力量。

参考文献:

- [1]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 [2]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2:2461-2468.
- [3]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89-92.
- [4]宋启东,毛春合.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转型的实践逻辑与创新路径[J].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24,23(4):39-45.
- [5]张艳丽.司马迁评鲁仲连“指意虽不合大义”辨析[J].渭南师范学院学报,2024,39(6):43-50.
- [6]宋致东,高元杰.鲁仲连精神与运河文化——以聊城“鲁连台”吟咏为中心[J].文化创新比较研究,2024,8(14):64-68.

Theoretical Interpretation and Contemporary Practic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Four-in-one” Connotation of Lu Zhonglian Cul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ross-temporal Dialogue

MA Hai-yan, YIN Li

(Liaocheng Vocational & Technical College, Liaocheng Shandong 252000, China)

Abstract: As a quintessential paradigm of the spirit of the Warring States scholars, the Lu Zhonglian cultural tradition is not a singular symbol of the “righteous man”, but rather an organic system comprising four interdependent dimensions: upholding great righteousness, resolving conflicts through wisdom, disregarding fame and profit, and prioritizing the people’s welfare.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deconstructs the core dimensions and internal logic of Lu Zhonglian culture through a dual approach of textual close reading and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grounded in both historical documents and contemporary contexts. From a historical communication studies perspective, it traces the interpretive trajectories and spiritual reconstructions of this culture across classical texts. Aligning with contemporary societal needs, it elucidates its intrinsic resonance with socialist core values and constructs a modern transmission pathway of “theoretical interpretation—practical transformation—dissemination and promotion”. Research indicates that the value core embodied in Lu Zhonglian culture possesses timeless vitality. Its modern transformation not only provides a practical paradigm for the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and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China’s outstanding traditional culture but also offers vital cultural resources for guiding individual values, enhancing grassroots governance effectiveness, and fostering cultural identity.

Key words: Lu Zhonglian; cultural connotation; four-in-one; historical inheritance; modern transformation; core socialist values